

中國的基督教烏托邦

耶穌家庭

(一九二一—一九五二)

◆ 陶飛亞 著

《中國的基督教烏托邦 —— 耶穌家庭(1921-1952)》

陶飛亞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04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62-996-199-7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件：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A Christian Utopia in China: The Jesus Family
(1921-1952)*** (in Chinese)

By Tao Feiya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996-199-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前言

社會日益進步，求材若渴。為了配合社會上不斷發展的需要，香港中文大學一直致力培訓高質素的人才。大學自一九六三年成立開始，便著重學術研究及研究生的培育。大學現開設一系列以研究為主的研究院課程，內容涵蓋不同領域的學科，讓逾千學生修讀。博士學位課程於一九八零年開辦，至今已有一千零五十位同學獲授博士學位。近年研究生新生人數續有增長，故博士畢業生在未來數年將有顯著增加。

博士論文一方面記錄了研究的結果，同時也是學生數年研習的見證。一部分博士論文可能已經在國際學術期刊或會議刊物上發表，讓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閱覽。然而，部分論文若能編輯成書出版，即可引起普羅大眾對有關题目的興趣，對博士學生們也是莫大的鼓舞。有鑑於此，大學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青年學人論文獎」，令以專著形式出版論文的意念得以實現，咸足欣喜。據此計劃規定，在一九九三年以後每年獲取博士學位的研究生，可以個人名申請或由學院院長提名，在該年角逐這個獎項，獲獎者由中文大學出版社把其論文編輯成書出版。全部參加角逐的論文都經有關學科具崇高學術地位的校外評審委員嚴格評核，每年只選出不多於三篇這類博士論文，接受這項殊榮。

本書正是這計劃其中一篇獲獎的博士論文。讀者除可透過本書分享作者的研究成果外，亦可體會到作者在研究中所付出的努力，及最終能帶出創新的意念和成果所產生的喜悅。我們期望在這計劃下出版的書，能啟發讀者的思考，使有關專題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討論。

最後，我想藉著這個機會祝賀陶飛亞博士在學術方面的成就。中文大學出版社在評審、編輯及出版方面提供的意見及協助，本人亦在此致謝。

楊綱凱

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院長

序 言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學者對基督教研究的興趣日濃，尤其是研究中國的基督教。有關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近年亦發現有不少的轉變，也可以說是一個典範的轉移 (Shift of Paradigm) 吧！

1980年代開始，西方學者如柯文 (Paul Cohen) 等提出了新的研究典範的轉向 (Paradigm Shift)，即從「西方中心」轉向「以中國為中心」的典範。¹過去的研究多是從宣教史的角度看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所關注的問題是傳教士怎樣將福音傳遍中國，如何使中國「基督教化」。「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典範則是強調須以中國為主體，並將中國基督教史放回中國的歷史社會處境中研究。但由於西方學者們所採用的資料多是來自西方，即大部分是留存在外國的西方傳教士或差會的檔案資料，他們的議題也自然地是從西方取材，仍然不能擺脫那些屬於西方、或是「以西方中心」的議程。因此，真正的「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典範，還應該是為留待學者們去尋索「中國方面的資料」，找回「中國的議程」，並且是重新尋覓「中國人 (包括中國信徒) 的看法」。

隨着大陸改革開放的深入，檔案資料逐步開放，內地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者，可以更方便接觸中國方面的檔案資料。過去由於國外的資料——尤其是歐美文字的資料多是由傳教士留存下來的，有關的文獻也多是從傳教士或是差會的角度所得的記錄，因此研究者難免會受到傳教士觀點及看法的局限。這些重新開放的中國資料正好可以補充外國資料的不足，有助學者重新發現傳教士以外的另類觀點與看法。不過，有些學者初時往往難於擺脫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立

場，片面地將基督宗教在華的活動視為「西方的文化侵略的工具」。為此，學者的任務只是單純地揭發傳教士的「陰謀」，或是從「陰謀論」的角度去詮釋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一切活動，包括他們的宣教與教育活動。²

1989年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舉辦的中國教會大學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也許標誌着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一個新開端。章開沅教授當時曾指出：「過去人們曾經將中國教會大學單純看作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它的發展變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組成部分。」³章教授建議學者們可以從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國的基督教，這當然不只是關乎傳教士在華的活動，也不只是限於基督教大學的活動吧。1990年代以來，內地學者亦多是從較正面的角度及採較積極的態度看基督教教育在中國的歷史發展，雖然他們的研究仍是集中在傳教士在中國的教育活動，譬如何曉夏、史靜寰合撰的《教會教育與中國教育近代化》⁴和王立新之《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⁵明顯地，學者們已真正轉到「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典範上。他們也不單是參考利用中國的檔案資料，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屬於中國議程的問題，譬如從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來觀察基督教問題。

不過，若從研究角度看，這些學者所關注的只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單向流動，即「西學東漸」的結果，譬如：西方傳教士在華教育活動是如何帶來中國教育的現代化等。他們仍然忽略了中西文化交流亦會對西方的基督教產生影響。基督教來華的傳教活動不僅是將西方文化帶進中國來，它也必然地產生另一個方向的交流，即是「東學西漸」的結果。正如季羨林教授在主編《東學西漸》叢書時也指出文化交流必須是有「拿來」、也有「送出」，這樣才可以說是真正的「文化交流」。⁶唯有從這種雙向的角度去看中西文化的交流，我們才可以較全面地及透徹地看到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1990年代中葉後亦有學者從事這方面的學術探討，如韓琦的《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及其影響》一書中亦指出：「耶穌會士來華把西方的宗教、科學傳授給中國，同時寫回歐洲大量有關中國的報導，使西方有更多的機會了解中國的科學與文明。」⁷這正說明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是雙向的。不單如此，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

的，也有不少因與中國人的接觸而被改變了的。較突出的研究是連曦的博士論文，題目便是：「傳教士的改變——在華美國新教差會中的自由主義」，⁸論文中清楚描述了幾位西方傳教士來華接觸中國宗教和文化後，如何將他們對自身來華宣教的想法逐漸改變過來。他們本想改變中國，卻至終被中國改變了。⁹美國學者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曾在1950年代初提出了「衝擊與回應」(Impact-Response) 的研究典範，¹⁰無疑地，西方的基督教教育對近代中國來說是一種衝擊，必然引起中國社會和人民的回應。但反過來說，中國的文化和社會處境也可以是對西方基督教教育的一種衝擊，西方傳教士也必須對中國的衝擊作出適切回應。因此，這種「衝擊與回應」也必須是雙向的。¹¹

由是觀之，要認真的研究中國基督教的歷史，我們必須從多個角度去思考，這樣才可獲至一個較全面、也較有創新性的研究成果來。在此，我也提出另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事實：即是中國基督教並不單純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而已，它也應包括那些屬於中國、或者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元素。若再以中國基督教大學為例，我也曾提過：「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產品，中國基督教大學不應只被視為是純屬於西方的東西，它也是蘊藏着不少中國的元素。這些中國的元素也是不斷在增加中。」¹²所指的就是中國基督教大學的華人信徒——包括校長、教授和學生這方面的中國元素。事實上，在重新發掘中國人的看法的時候，我們亦不能只看到中國基督教圈外的「反帝、反文化侵略」的立論。在中國基督教史中，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部分，即是過去一直以來被學者忽視的「華人信徒」的看法。「華人信徒」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種形而上思維的選取。「華人信徒」是活生生的人，他們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中國人，也是一班有真實信仰體驗的基督徒。我們可以去問：究竟「華人信徒」是怎樣選擇一種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在選擇宗教信仰時，他們是如何可以同時擁抱着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他們是怎樣從中國人的角度詮釋基督教信仰（創造本色化的神學）？又是怎樣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理解中國的問題（確定中國的議程）的？這些都是十分具體、實在的問題（像選擇穿唐裝或西裝衣服一樣）。若是從這樣的角度去看，我們就不難發現中國基督教（或者是中國基督教教育）事實上也可算是一種中外合作的結晶品。¹³

陶飛亞博士的研究正是我們多年來所期望的。他研究的材料不單是大部分來自中國方面的資料，更是以中國信徒為其研究的對象。他亦嘗試從中國信徒身上重新發掘中國的議程，深入探究中國信徒是怎樣理解中國的社會及處境問題、怎樣看待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及怎樣從中國人的角度詮釋基督教信仰，將基督教變成一個屬於中國人的基督教。

近代西方學者亦有提出類似的看法，譬如裴士丹 (Daniel H. Bays) 教授在他的書中亦有指出「華人信徒研究」可以是研究中國基督教史的一個新的發展方向，這樣的研究將有助於重新尋找一個屬於中國本土的基督教發展史來。¹⁴ 其後，魯珍晞 (Jessie Lutz) 教授在一個研討會上亦大膽提出她的構思，即是要嘗試以中國基督徒為主體，重新劃定中國基督教歷史的分期。¹⁵ 事實上，在中國方面，早在1920年代，華中大學的韋卓民教授已經提出了必須要以中國基督教為本位的看法，他所強調的正是：「要使基督教信仰在中國有活的生命力」，就必須要「讓基督教在中國的土壤中生根成長」。¹⁶ 王治心在討論中國本色教會時，也曾用過一個比方——他以「落花生」的比喻生動地描述了中國基督教會的本色化運動。「花生」在中國本稱為「洋花生」，因為它是從外國進口的。但經年累月後，花生已可以在中國的土壤裏培養和栽植，即吸收了中國的滋養料，而成為了中國本土培植的花生了。¹⁷ 同樣地，若果基督教的信仰能夠在中國逐漸融入於中國文化之內，成為中國人生活實踐與流露生命感受的一種表達方式。這樣，它也自然地成為了一種完全屬於中國人的基督教來。¹⁸ 若是從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基督教在中國的本色化運動，並不一定如有些學者所說：「它必然是具有強烈的宣教關懷的。」¹⁹ 相反地，基督教在中國的本色化也可算是中西文化在中國相互交流、合作下的一種自然結果。²⁰ 陶飛亞研究的中國基督教群體——耶穌家庭便是一個生動的例子。

耶穌家庭的創始人是敬奠瀛，他是山東泰安馬莊敬家杭人。敬奠瀛出身於農民家庭，初時接觸了美國傳教士，後來他獨自創立了耶穌家庭，滲入了不少中國民間宗教及傳統文化元素，更是配合了當時中國農村社會的需要，發展了一種近乎共產主義式的宗教社群，成為了一個具十足中國本色的基督教群體。²¹ 耶穌家庭教會雖然是借用了西

方傳教士帶來的基督教觀念，但它確亦是中國人用自己的文化、生活經驗去理解基督教的信仰，並且將聖經的教訓結合在中國的文化社會生活中的一種產品。其中有三個特點值得留意的：（一）耶穌家庭強調家長制，由一家之主安排一切家內事務，這是最有中國特色的基督教；（二）耶穌家庭出現在1920年代，開始時也是實行土地財產公有，一度非常興盛，但只是延續了30年左右的時間，便在內外交困中消亡了；（三）耶穌家庭所用的詩歌，大部分是由境內或山東省附近地區的民間歌謠，配合耶穌家庭的信仰，也充分地表達着中國人的一份宗教情懷。耶穌家庭在中國雖然只活躍了三十多年，但它在表達中國人對集體公有、平等平均理想的嚮往和追求方面卻有深刻的意義。本書用「中國的基督教烏托邦」來概括耶穌家庭運動，看出了這場運動的本質特徵，這是作者很有見識之處。實際上，這也是下層基督徒使基督教在中國本色化的一種努力，就像上層精英趙紫宸、吳雷川等嘗試用不同模式將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結合起來的努力一樣，儘管他們的道路都沒有走通，但他們的事業和經歷已經成為昭示後人的中國基督教史的一個重要部分。本書給我們描繪了長期被忽視的草根基督徒在底層社會的生活，這無論對基督教史還是對廣義的歷史研究都是一種貢獻。

我有緣初識作者是在1991年6月。當時我們共同參加在南京師範大學舉行之第二屆中國教會大學史國際研討會。他那時還是山東大學的教師，正在做有關齊魯大學（原山東基督教大學）的研究。因為有共同的學術興趣，從此交往漸多。1993年12月，我邀他參加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舉辦的中國基督教大學歷史文獻國際研討會，但因他在美國北卡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從事短期研究，提交了論文但未能赴會。1994年5月，他返國後我應邀訪問山東大學，了解齊魯大學的資料情況，並同他討論以「基督教大學與國學研究」為題進行合作研究。前後三年完成《基督教教育與中國社會叢書》第一輯《基督教大學與國學研究》，由福建教育出版社於1998年出版。由於合作關係，我亦協助他申請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的資助，來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從事研究。在中大數月，他很喜歡中大的環境，尤其是這裏作為中西文化交匯處獨有的學術研究氣氛，以及經常能向來

訪的國內外知名學者請教、參與一流水平的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因此，他決定申請來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進修。終在1998年初，他開始修讀宗教及神學部的博士學位課程，專修範圍是「中國基督教史研究」。

陶飛亞是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內地學生中第一位選讀「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博士生，我有幸成了他的博士論文的指導老師，能與他一同見證這篇博士論文的撰寫歷程。在此期間，他虛心求教、勤奮盡責；除了下功夫發掘資料外，還努力探討宗教學的理論和方法，在古今中外烏托邦個案的比較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框架，足見他是一位能認真做研究的人，頗得老師們好評。我亦高興能與他亦師亦友，飯前課後，坐而論道，不亦樂乎！飛亞三年內修完所有博士課程，並創作了這篇在答辯中被中外專家評為優等甲級的博士論文。論文隨即獲宗教系老師們及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的推薦，參與香港中文大學的「青年學人論文獎」遴選比賽。作為他的論文導師，我自然感到光榮。

今更喜見其論文榮獲香港中文大學2001年度青年學人論文獎，並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付印出版，俾得更多讀者賜正，故欣甚為之序。

吳梓明

2003年8月13日

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辦公室

Foreword

It is my pleasure and honor to inscribe a preface for this outstanding book written by my friend and colleague, Professor Tao Feiya of Shanghai University. A revision of Professor Tao's excellent dissertation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work, *A Christian Utopia in China: The Jesus Family (1921–1952)*, is one of the very first historical works from China which analyzes deeply both the context of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y and also the history of indigenous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I believe that in future it will be viewed as a landmark volume, pointing the way towards the more objective stud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re are several noteworthy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One is the very clear historical context of Shandong province earl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ovided by Professor Tao. Drawing partly on his earlier fine study of Christianity in Shandong society co-authored with Professor Liu Tianlu, he shows convincingly how this context contributed directly to the Jesus Family's formation. Tao's description of the movement's founder, Jing Dianying, is equally insightful. He paints a very understandable picture of this fascinating religious visionary, who in some ways can perhaps be compared with Hong Xiuquan.

One of the other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of the study is how it deals objectively with both foreign missionary and native Chinese elements in the makeup of the Jesus Family. For example, Tao acknowledges the importance of foreigners such as Nora Dillenbeck and L. M. Anglin in shaping Jing Dianying's faith, but he portrays the Jesus Family as a thoroughly Chinese movement. I agree. For most of its life the Jesus Family had almost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oreign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everything to do with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Another commendable aspect of this study is its balanced treatment of the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and disbanding of the movement, and the role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in that process. In addition, the entire study is nicely

situated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 cross-cultural discussion of utopias as broader historical phenomena.

Finally, I admire Professor Tao's work because it really is a path-breaking study. In most aspects of this research and writing, Professor Tao by necessity has had to function as a pioneer. No one has previously done a comparable combination of research topics centered on Christianity and popular cultur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at is, viewing it as a Chinese, not a foreign, phenomenon. Moreover, Professor Tao based much of this work on a large collection of unique and diverse documents painstakingly gathered from local archives in Shandong, supplemented by interviews (some of them hard to obtain) with many participants. His use of these archival and oral history materials is exemplary, and indicates the work of a mature scholar. But it took a great deal of very hard work to do it. I know this because of many conversations with Professor Tao during the years we were working on related topics, when we shared both materials and ideas.

Finally, this book is also well organized and clearly written. I believe that scholar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omparative religion alike will enjoy and profit from it. I am proud to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a research project that made a small contribution to support of this study, and I am very pleased to recommend this work enthusiastically to my colleague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Daniel H. Bays
Grand Rapids, Michigan, USA
30 September 2003

(Daniel H. Bays i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Director of the Asian Studies Program at Calvin College, USA, and Professor of History Emeritus, University of Kansas, USA.)

致 謝

本書是關於中國的基督教烏托邦——耶穌家庭的歷史研究。此項研究最初是我在國家教委1996-99年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基督教自立運動」中的一個部分，後來由於資料的關係，整個研究就集中到耶穌家庭方面了，並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時，成為博士論文的選題。對國家教委社科基金的支持，謹表示衷心感謝。本文初稿承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羅炳良教授惠薦參與2001年度大學優秀博士論文的評選，有幸獲獎並由大學資助出版。對母校師長的關愛和幫助，後學銘記在心。

本書的完成要特別感謝我的導師吳梓明教授。他不僅嚴謹地審核我的選題報告，在整個寫作過程中悉心指導，還多次推薦我參加相關的國際會議及慨允我使用他收藏的資料。他對中國基督教史特別是宗教思想方面的深刻理解對我啟發很多，我們間的每一次討論常常給我很多幫助和鼓舞。吳教授平易謙和、對學生真誠關心，使我在中文大學緊張的學習成為一次愉快的經歷。

我還要感謝美國堪薩斯大學歷史系裴士丹 (Daniel H. Bays) 教授和臺灣大學歷史系查時傑教授。作為研究中國基督教史的權威，裴教授最初對耶穌家庭的研究激發了我對這個基督教社團的興趣。裴教授還始終關心我的研究，多次寄來重要的資料和新的研究成果，並與夫人裴珍妮 (Janice Bays) 從美國來中文大學主持我的論文答辯。查教授是研究基督教史的前輩，對耶穌家庭的研究獨有心得，在我訪問臺灣大學時曾予多方指點。

我很感榮幸的是宗教系黎志添教授、神學組盧龍光教授、歷史系梁元生教授能擔任拙文的答辯委員。各位先生從不同的專業領域對拙文提出了非常中肯和到位的批評和建議，他們的學養和學風使我受益匪淺。

筆者先前修讀中國近代史，宗教學知識比較欠缺，在香港中文大學學習期間，我的很多老師，如宗教系的歐大年 (Daniel L. Overmyer) 教授、李熾昌教授、賴品超教授、譚偉倫教授和王崗教授，神學組的溫偉耀教授和江大惠先生在宗教理論和基督教專門知識方面給筆者很多指點。另外，當時正在該校做博士後研究的復旦大學徐以驊教授和四川大學鄒重華教授常在不拘場合的討論中給筆者很多啟發。內地和香港研究中國基督教史的諸位先進及師友，如山東大學哲學系蔡德貴教授、歷史系路遙教授、蘇位智教授、劉天路教授、復旦大學宗教系李天綱教授、華中師大劉家峰副教授，還有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同學和朋友陳同、朱峰和劉賢等都曾給予我各種幫助。上海人民出版社王衛東博士幫助繪製地圖。在此筆者一併向他們致以誠摯的感謝。

本書寫作中，亦曾受益於張亦工先生的賜教。今先生已歸道山，但當年在山東大學義和團研討會期間的切磋與指點，終不能忘也。

本書在收集資料時，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浸會大學中國基督教歷史資料部、香港大學圖書館、山東大學圖書館、泰安市檔案館、泰安市泰山區檔案館及山東省檔案館的熱情幫助，原全國政協常委、山東省基督教三自會主任王神蔭主教，生前也曾在資料方面給予了寶貴的幫助。特別要指出的是原馬莊耶穌家庭的信徒們和參與革新的原工作組幹部多次接受筆者的訪談，儘管他們年事已高、對歷史的看法見仁見智，但都不厭其詳地向筆者講述他們過去的經歷，不僅為這項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而且使筆者對這段歷史有一種感性認識。其中尤其是馮蘭馨先生、趙丙盛長老、李瑞君長老、趙培讓長老、張奇真先生、張學民牧師、敬福音先生、葛紹恩女士、宋銘竹先生等，多次撥冗詳細解答筆者的問題，他們對自己信仰的虔敬和對歷史的坦誠，使我深受感動。

在本書出版過程中，我很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邀請的匿名評審的專家們。在很多情況下，我根據評審者的意見修改了書稿，有些

還作了較大的調整。但個別問題上我的看法與評審者意見並不完全一致，並決定保留我的看法；還有一些地方我看到他們建議的合理性，但因考慮到本文的重點而只能割愛。無論我的回應如何，我對他們深思熟慮、實事求是的評論深表謝意。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陸國榮博士在兩年時間內，一直關心拙作的修改，本書編輯謝偉強先生為拙著的出版費心不少，筆者對他們心懷感激。自然，書中所有不足，責任全在作者。

最後，對我的妻子魯娜和女兒陶小路，我應該感謝她們的太多了。她們的理解和期盼，是促使我盡快完成這一研究的壓力和動力。本書是獻給她們的。

導 言

……耶穌家庭分南北兩處，其所營之共同生活方式，與普通一般教會迥異。耶穌家庭，儼如一大農場，其間所有田畝(百餘畝)房舍農具家畜，悉由組織家庭之各分子自動供獻，家庭一切，公有公享，無分彼此。家中一切用度，由家人共同擔負，自給自足，衣食住行與一般農民相同。……

……凡願意入家者，須經忠實之信徒介紹，確知其為人誠信，甘願同甘共苦，方得入家。耶穌家庭，原為單身男女而設，然已婚夫婦，亦得另闢房舍居住。其餘諸人，則男女分住。……

耶穌家庭之生活方式，甚近似初期教會生活情形，一方面共同生活，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而另一方面則向外作佈道工作。……彼等深信昔日主如何差遣門徒，今日亦可同樣實行。¹

這段當時的記載向我們生動地展示了實行初期教會「共產」制度的基督教社團——耶穌家庭在1940年代的生活畫面。這個所謂的耶穌家庭是從20世紀20年代逐漸在中國北方，在離山東泰山約30公里的一個小鄉鎮馬莊興起的。到30年代初，這個團體在馬莊附近的曠野中建起一個新的村落。先是幾十人，後來有四五百人生活在這個村子裏。與華北鄉間的普通村落不同：這裏的居民男女老幼全是基督徒，這兒沒有私有財產制度，人們共同勞動共同生活，基本的醫療教育、衣食住行乃至生老病死全都由團體負責。宗教生活在這裏特別火熱，聚會禮

拜祈禱唱詩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從這裏出發的傳教隊伍把這種教會模式一直推廣到邊遠省份。這個中國基督教史上有名的馬莊耶穌家庭，從1921年初醞釀生長，到1952年夏季革新運動後從歷史上消失，前後存在了31年。²

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代中國基督教界對耶穌家庭的看法曾發生過戲劇性的變化。革新前，它被稱為是實行「共產生活方式」的「中國土生土長的新興教會」；革新後，它被認為受帝國主義支持，是一個封建統治下的「人間地獄」。³改革開放以後，對耶穌家庭的評議仍少。中國基督教協會主席丁光訓先生1998年在為古愛華 (Winfried Gluer) 著作撰寫的序言中曾經有「封建風味共產主義的耶穌家庭」的說法，可惜沒有進一步的分析。⁴對耶穌家庭看法上巨大的反差，本來是激發歷史學家研究興趣的動力之一，但大陸學術界宗教研究邊緣化的狀況，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才逐漸改變，就耶穌家庭的學術研究而言，除了不多的調查報告外，嚴格說來至今仍是很薄弱的。⁵

相對而言，海外學者較早對耶穌家庭的一些方面進行了考察。在中文著作方面，最早的是台灣大學歷史系查時傑教授關於耶穌家庭經濟形態的研究。查文從「基督教鄉村教會的個案研究」角度，對耶穌家庭回應農村經濟問題的努力作了探討。查認為耶穌家庭在宗教上以「靈恩派」促進教會發展，在經濟上採取復古路線的共產方式，是一個既照顧信徒需要、又解決實際生活的兩全兼顧的新模式。查文在家庭經濟制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指出了耶穌家庭採用「共產體制來解決農村經濟的問題」，看到了這個基督教社團「世俗活動」的社會意義。80年代香港童小軍曾經訪問過耶穌家庭，並發表了有關訪問報告，澄清了耶穌家庭歷史中的個別問題。鄧肇明在其《滄桑與窘境》中有一節寫到耶穌家庭，該文篇幅雖小，但卻是最早對耶穌家庭與三自運動的史實作了比較準確的敘述。早年參加過耶穌家庭的美籍華人朱信博士在《我所認識的耶穌家庭：介紹和評論》一文中對耶穌家庭的宗教生活有相當充分的描述，補充了以前資料的薄弱之處。⁶

西文著作對耶穌家庭的研究也屈指可數。最早有芝加哥麥考密克神學院 (The McCormick Theological Seminary, Chicago) 羅密各 (Theodore F. Romig) 教授在1950年發表的關於耶穌家庭 ("The Family